

插图本

中国新闻社会史

李彬 著

THE SOCIAL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HINA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闻社会史

插图本

李彬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闻社会史: 插图本/李彬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302-17344-1

I. 中… II. 李…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2221 号

中国新闻社会史 **插图本**

责任编辑: 纪海虹 王巧珍

装帧设计: 曲晓华 韩宇

责任校对: 王凤芝

责任印制: 孟凡玉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密云胶印厂

装 订 者: 北京市密云县京文制本装订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 240 印张: 29.25 字数: 53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定 价: 49.8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028021-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目 录

代 序 “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	1
开场白	9
第一讲 远古回声：青灯残卷话新闻	15
漫谈历史与新闻	17
先秦 / 汉魏 / 隋唐	
邸报话题	30
古代报纸的两条发展线索	37
第二讲 西风东渐：新闻传播发新枝（1815—1895）	43
外报：近代报刊的先导	47
鸦片战争前 / 鸦片战争后 / 《点石斋画报》	
“自强”与国人自办报刊	61
王韬及其《循环日报》（1874）	63
第三讲 天崩地坼：清末民初涌高潮（1895—1919）	67
戊戌变法：第一次办报高潮	73
睁眼看世界的“三部曲” / 《时务报》与“时务文体”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 / 维新派新闻思想	

辛亥革命：第二次办报高潮	92
小册子与“苏报案” / 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	
《民报》VS《新民丛报》 / 于右任及其“竖三民”	
革命报刊与武昌首义	
五四运动：第三次办报高潮	111
历史扫描 / 新闻专业主义 / 新闻教育和研究 / 职业记者	
第四讲 风雨苍黄：三家天地归一统（1919—1949）	139
革命报业	142
大革命年代 / “一社一报” / 红色中华	
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 / 人民广播事业 / 记者节	
“新华社最好的记者” / 范长江与邹韬奋 / 外国记者与中国革命	
影像中的中国革命 / 革命报人大会师	
“党国”报业	191
“党国”事业与“党国”报业 / “一报一社一台”	
新闻统制 / 抗战英烈、报界豪杰 / “大后方”的新闻教育	
覆亡前夕 / 从《长河》看媒体	
民间报业	216
都市生活与商人报刊 / 新闻商人成舍我	
国闻通讯社与早期《大公报》 / 新记《大公报》 / 张季鸾	
胡政之 / 是是非非《大公报》 / 《观察》与“中间路线”	
《新民报》与《文汇报》 / 自由主义与文人报刊	
第五讲 红日初升：民族国家谱新章（1949—2008）	259
百年历史百年情	260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民族国家建国之路 / 现代媒介及其生成	
新中国的光荣与梦想 / 高家村故事	
扫描：新闻中的社会，社会中的新闻	303
新时期掠影（1978—2008）	332
“小平，您好”和“我要上学” / 80年代：思想启蒙、狂飚突进	

80 年代的新闻界 / 《河殇》及其反思

90 年代: 市场导向、多元分化 / 新自由主义 VS 新左派

新媒体与媒体融合 / 都市报与虚假新闻 / 媒介批评

第六讲 文化政治：放眼全球谈新闻	389
学术与政治——理论视线	392
中国与世界——历史视野	405
新闻与社会——专业视点	417
未完结的历史与未完结的话题	425
附 录	
20 世纪中国百篇新闻作品一瞥	433
后 记	456

代序

“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①

新闻史研究的地位，在中国向来比较尴尬。一方面，谁都不否认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意义，不否认其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另一方面，谁也不觉得新闻史研究同新闻传播有多少非此不可的关联，最多谈谈古为今用的道理。然而，真正践行古为今用的又少之又少，相反，倒是眼见许多“古人”的弯路，今人又义无反顾、乐此不疲地重走一遭。在遍地开花的新闻院系，新闻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尤为突出。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无不认为这是一项基础功课；而另一方面，从老师到学生，又无不为之头疼，教者昏昏，学者沉沉。于是，对待新闻史研究，常见的情形总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就像过去宗祠里的祖先牌位，逢年过节的时候受受朝拜，平时则冷冷清清，寂寂寥寥，灰头土脸，无人过问。

问题与症结

那么，问题及其症结在哪儿呢？既然新闻史研究在新闻传播学科具有首屈一指的基础地位，那么为什么又门前冷落车马稀呢？简要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如同新闻学的其他研究一样，受益于新闻史研究的主要有三方，即业界、学者和学子。显然，业界基本不关注新闻史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同新闻实践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也确实没有多少记者、编辑、老总、制片人等，会怎么关心历史上的某份报纸、某个报人、某篇报道，这些“陈糠子、烂谷子”看上去同风风火火的新闻实践仿佛关系不大。新闻院系的学子同样如此。除了必修课、拿学分、完成培养方案等，绝大多数本科生、研究生也不觉得新闻史有什么意义，最多了解一些新闻传播的演进脉络，而且不等毕业说不定就全部交还老师了。三

^① 刊于《新闻大学》2007年春季号。《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7年8月号转载。

方里只有学者才会由于某种需要，认真而偶尔地翻检一下有关新闻史研究，就像查字典一般确认某个事项。于是，说起来地位显赫的“基础学科”，却与广大新闻人基本无关，与众多新闻学子基本无关，而仅仅成为专家学者“寻章摘句”的领域。由此一来，新闻史研究自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欲不尴尬，其可得乎。

莫非数以百万计的新闻人、数以十万计的新闻学者和学子，真的不喜欢、不需要、不关注新闻史研究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对克罗齐所谓“真的历史”或者真的新闻史，始终热情不减，青睐有加。以2006年去世的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为例，不少中国记者就坦言自己深受其影响。再如，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人们越来越关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课题，深为目前“外宣”局面所困扰，有关方面也不惜血本展开研究，可惜成效似不显著。其实回顾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外宣工作的成败得失，就有许多值得汲取和提炼的有益内容，如外文局前局长段连成就是一座研究“富矿”，他的《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等文本及其背景就值得深入讨论。近年问世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冰点故事》（李大同）等业界人士撰写的新闻史著述，甚至成为坊间畅销书。至于许多新闻史的“警句”更是流播人口，深入人心，如“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等。总之，新闻史研究并非“鸡肋”，而是同新闻实践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那么，新闻史研究何以处境尴尬呢？

对此，各方已经多所论列，不乏精辟之见，比如常说的“革命史范式”及其局限。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多少改观。大约十年前，笔者曾在《新闻大学》撰文，侈谈所谓“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建议”，还蒙编辑部加了“编者按”。其中，也谈到新闻史研究的问题及其根源：

横着看，是深受近世科学理性支配、以所谓“积累准确的知识”为唯一目标的实证主义史学；纵着看，是华夏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史官文化”。其特征或可归结为“微观·实证·事态”，即力求以史料勾勒一事一物的原貌，再现客观的历史事实，甚至不惮其烦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

……

新闻史研究的症结或可归结为对思想的抽象和对诗意的想象之轻视……在我们看来，真正的历史既不是死且不朽的“出土文物”，真正的史学家也不是矜奇炫博的“古董迷”，史学家皮雷纳说得好：“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对生活的

热爱，对生命中大诗大美的眷恋，正是揭示历史进程、展现历史魅力的动力与源泉，也是新史学提倡由今及古的“倒溯”法，张扬以人为本位、以问题为主导、以想象为法门的**研究立意之所在**^②。

现在看来，这些认识不免肤浅，尚不成熟，正如“编者按”所指出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光见到人仍然是不够的，还应看到人和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并运用它来指导实践才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不过，即使如此，其中对新闻史研究及其问题的感觉应该说还是切当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知识、没思想，有专业、没文化。也就是说，新闻史研究虽有汗牛充栋、成千累万的历史知识，却没有多少耐人寻味、启人心智的思想理论；虽有考订精审、辨析入微的专业积累，却没有**什么千回百转、留韵无穷的文化蕴涵**。总之，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过于受制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过于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僵死名物，而未**免忽略历史与史学的鲜活要义**。这大概才是新闻史研究不尴不尬的症结吧。

新史学与旧史学

为了突破这种尴尬局面，许多学人一直在积极探求，一些博士论文尤为突出，如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赵月枝等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等。笔者近年来也在艰难探索，希望走出一条新闻史研究的新路，至少希望对新闻学子能有一点启发性，甚至吸引力。比照当代“新史学”，不妨将这种不同既往的新闻史研究称为“新新闻史”。

关于新史学，已有大量研究和论述。简言之，新史学不同旧史学者主要有三点，一是更注重史学的“当代性”，二是更注重史学的“思想性”，三是更注重史学的“叙事性”。在新史学看来，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过去，不是考古的名物，而是生生不息的人类实践和息息相通的社会运动，既包含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往昔纠葛，更体现着当下此刻的现实关怀。按照新史学的一般理解，所谓历史乃是由两面所构成，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一面是当时发生的事实，一面是后来讲述的事实。没有事实而只有讲述则属于文学，只有事实而没有讲述则属于乌有。事实固然是第一位的，没有事实便没有历史，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则在于人的讲述。任何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讲述，而不可能是已经发生、一去不返的事实。为了避免混淆，不妨将历史的两面分别称为历史和史学。历史

^② 李彬：《对新闻史方法的思考与建议》，载《新闻大学》，1996年冬季号。

都是一次性的，一旦发生便不可能重演，正如不能让红军再走一遍长征路，而史学则是对历史的叙述、复述或讲述。除了亲历，一般所知所说的历史，说到底都是后来的讲述即史学，不可能是当时发生的一次性事实即历史。对此，法国思想家、史学家雷蒙·阿隆，在回答“什么是历史”时有一段精当的论述：

人人都知道，历史这个词，不管是在德文、法文还是在英文中，都是模糊的，它既指现实也指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在以上三种语言中都存在着一些可以对以上两种情况进行区分的词。英国人用 history 这个词，也用 story（故事）这个词；如果想给历史一个定义，他们会说：history is the story of the dead told by the living，用法语讲：历史是活人讲的关于死人的故事。德国人区别 Geschichte 和 Histoire 这两个词：Geschichte 既指现实也指我们对它的认识，Histoire 则只指认识，或我们重建、讲述、撰写过去的方式。在法语中，必要时，我们可以用 historiographie（历史编撰）这个词来与模棱两可的 histoire 形成对立，特指撰写历史的方式；但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历史理论及治史法的书往往不对历史这个词作明确的区分，轮换着使用它的两个含义，既用它指认识历史这一主观现象，也用它指假定存在的客观或客观化的现象^③。

将历史分为事实与讲述，分为事实性的社会实践与讲述性的史学研究，并将立足点从前者转向后者，是各种新史学的共同立意与核心观点，由此出发自然形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等命题（详见拙著《全球新闻传播史》导言）。由此出发，也就可以大致理解“新新闻史”的基本思路和学术志向。

社会史范式

那么，究竟何谓“新新闻史”呢？大略说来，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所谓社会史的范式，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不言而喻，社会史的范式有利于摆脱目前比较单一，乃至逼仄的研究思路，特别是那种一报、一刊、一社、一台的考据式研究。考据式的研究固然必不可少，可以作为新闻史研究的资料，可以成为编年史的依据，但不可能成为活生生的历史。什么是活生生的历史或新闻史呢？按照通常的理

^③ [法]雷蒙·阿隆：《论治史》，冯学俊、吴泓缈译，95-9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

解，历史也好，新闻史也罢，无非是些“陈年老账”，是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逸闻趣事。所以，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当然没有谁有兴趣去翻检这些陈年旧账，特别是在全球化风起云涌、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年代，更没有谁有心思关心那些“断烂朝报”。其实，如前所述，如果懂得新闻史远非一次性发生的“历史”，而是不断讲述的“史学”，而这种讲述又同当下的社会情景息息相关，并且构成当代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专业认同的命脉，进而使新闻史研究的轴心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成为影响现实、左右实践、推动学术的一大动力，那么，新闻史的形象与意义自然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社会史的范式，早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大趋势。这种范式既不同于“伟人家谱”的铺陈，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名人行止，也不同于“意识形态”的说辞，如“联共（布）党史”、“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等理论主张。社会史研究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或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类似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追求。而目前通行的新闻史研究，则主要着眼于新闻事业本身的状况，局限于报刊等媒体活动的具体层面，至多属于新闻传播的本体叙事。社会史范式的理路则有所不同，它不仅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而且更注重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多重关联，致力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而非满眼树木，不见森林，满地珍珠，不见项链，即赵世瑜先生概括的：“综合地、总体地研究某一历史现象，正是社会史的特征；或许，当人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利用社会史的范式去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军事史的时候，后面的这些学科分支也会被改造成总体史、综合史。”^④马敏先生的一段论述说得更加周详：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或称“新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显然，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

^④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2）。

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⑤

具体说来，社会史的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可以体现为三个融合，一是新闻与社会的融合，二是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三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新闻与社会的融合，是将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打通，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是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历史打通，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而不是纯粹罗列史实或纯粹讲解理论。没有历史的理论，往往是空头理论，而没有理论的历史，也往往成为知识的堆积。正如14卷《俄国史》作者E.H.卡尔在1960年代问世的名著《历史是什么》里写到的：“在德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出版了一大批，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大批枯燥无味、满页事实的历史著作和专门之极的论著，也造就了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是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以兼容新闻与传播的视角，透视新闻传播的纷繁图景，追索其脉络，描绘其状貌，解析其意义，探究其规律。

叙事学方法

有关史学的叙事问题，也是当代新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别是后现代史学，更是将史学径直当作文学。且不管怎样看待新闻史研究，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即新闻史研究缺乏叙事，少情寡趣。特别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新闻史，不管是课堂讲授，还是教材内容，似乎总是一种刻板模式，即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出版某份报刊，几开几版，发行几多，刊发什么报道，产生什么影响等。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流水账，里面难以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满目多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如今尽管增加了广播、电视、网络等内容，但这一叙事模式依然如故。本来，历史是活生生的，社会是活生生的，新闻更是活生生的，为什么讲述他们的新闻史却总是死板板的呢？难道真如先贤所说的，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2006年的“易中天现象”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其中透露的信息值得史家留意。这种现象也从一个方面提示人们：史学首先是一种叙事。事实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史学、脍炙人口的史学，首先都体现为生动有趣的叙事，而不是干巴巴枯索的说教。如果说思想是史学的灵魂，那么叙事就是史学的生命。遗憾的是，

^⑤ 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册，503~50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新闻史研究不仅常常丢失自己的灵魂，而且每每丧失自己的生命，最后往往只剩下一具木乃伊似的躯壳，而躯壳除了猎奇和考古的嗜好，当然不容易赢得人们的好感了。

其实，史学与叙事的关联可谓源远流长。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史不分家”，追溯起来这句话还是从古代治史传统引申而来的。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史传往往具有鲜明生动的叙事意味，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不妨当文学作品看待。比如，先秦时代的《左传》、《战国策》、《国语》、《吕氏春秋》等，无不文笔鲜活，文采斐然；司马迁甚至被毛泽东径直称为一个“文学家”（《为人民服务》），他的《史记》更被鲁迅先生盛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魏晋风度和魏晋风流画像的文人笔记《世说新语》，在记人叙事上同样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等等。唐代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回答古往今来为什么有名的文人多而出色的史家少的问题时，曾将优秀史家的禀赋概括为三个不可或缺的要害，即所谓才、学、识。学自然指学问，史家不能凿空而论，而必须言之有据。识则指见识或思想，没有思想，再多学问也难成大家。至于才则指文才或才华，史家如果没有文才或才华，那么即便学问很大，见识很高，可惜写出东西来却了无生趣，索然无味，同样难成大家。可见，中国古代的治史传统对文笔、文采、文辞等叙事因素一直非常注重。

不独中国有文史不分的特征，西方以及其他文明的治史传统也同样如此。比如，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把一部《希罗多德历史》写得摇曳生姿，妙趣横生。另外，同时期的其他史学名著，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塔西佗历史》（塔西佗）、《长征记》（色诺芬）、《高卢战记》（恺撒）等，也无不以优美的文笔、生动的故事和出色的叙事见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专司历史的女神克利俄（Clio）不仅属于九位艺术女神之一，而且名列九位缪斯之首，以至于英国现代史学家屈维廉（G. M. Trevelyan）为批评实证主义史学而发表文章就以《克利俄：一位缪斯》为题。当代的例子同样举不胜举，别的不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风靡天下数十年，其中除去精深的研究与独到的思想，也得益于鲜活有趣的叙事。甚至罗杰斯的传播著作《传播学史》，居然也以叙事生动、引人入胜著称。

总之，不管是社会史的范式，还是叙事学的方法，归根结底都在于激活或复活新闻史的生命力，让新闻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使学人受益，也使“报人”受益，既使新闻学受益，也使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受益，最终形成一幅新的、活泼泼的、洋溢着生气、焕发着思想与文化魅力的“新新闻史”。当然，提出一种设想是一回事，实现这种设想又是一回事。实际上，所谓“新新闻史”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晶，不如说是抛砖引玉的瓦

砾。“知我者，谓我心忧”，但愿这里的一点粗浅设想，能够成为“新新闻史”的一块小小铺路石。

[拓展阅读]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雷蒙·阿隆：《论治史》，三联书店

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杨念群等：《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开场白

本书是一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课堂讲录，主要讲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演进，特别是勾勒鸦片战争以来新闻事业的历史轨迹，同时透视其间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动因。之所以说“特别是”，是因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实际上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而生成演进的，基本属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运动。通过这些讲述和勾勒，不仅希望揭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同时更力求探讨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我们的讲述更关注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大关节、大问题，而对具体的、微观的事物则删繁就简，撇开如山似海的“断烂朝报”，提纲挈领地展现一幅宏观而有机的历史图景。我们的目的是让普通学生都能把握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脉络与社会关联，从而在形成专业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中国新闻人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

中国新闻传播史学科一方面蔚为大观，成果丰硕，另一方面又存在亟

待开拓的研究领域。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或许还不在于具体的研究事项，如材料的发掘、体例的突破、观点的创新、表述的生动等，而首先在于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如果说以往的研究多属于“历史科学”，那么这个问题则涉及“历史哲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讲了三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若按这种标准衡量，传统的新闻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第一个层面，即原始的历史或“纪念碑式的历史”（克罗齐）。《剑桥近代史》丛书第一版主编阿克顿勋爵曾经悲叹，这种传统大有迫使一位历史学家变成百科全书编纂者之势，即西哲所谓 *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

当然，这种局面形成与发展趋向自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事实上，只有经过原始的历史，才能展开反省的历史，进而抵达哲学的历史。正是由于近百年来几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学者的孜孜探求，由于他们在历史科学上



方汉奇

所做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皇皇建树，后人才可能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展开反思，才可能激发新的学科增长点 and 学术创新点。否则，如果对基本史实都不甚清楚，对主要脉络都不甚明了，那么还侈谈什么历史哲学呢？就此而言，后人不能不对以戈公振先生、方汉奇先生、张隆栋先生、李瞻先生等为代表的新闻史传统永远充满敬意，同时对前辈学人所作的一切研究表示“同情之理解”。

对传统新闻传播史的反思，离不开史学领域的总体变迁及其背景。大略说来，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犹如一道隔开“旧史学”和“新史学”的鸿沟。旧史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基本延续19世纪实证主义传统，特别是德国“兰克学派”的学术风格与研究精神。关于这种史学及其缺憾，原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1970年代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之“历史学卷”里批评道：

大量的历史著作——也许占全部成果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完全是因袭常规的，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

新史学虽然风貌各异，取舍万殊，但在一系列内在理路上又颇多共通之处，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众所周知，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是出自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这个命题可以概括为这么三层意思：即复现历史都表现为现时的思想活动；研究历史都由现时的兴趣所引发；把握历史都按现时的水平去衡量。这三者都展示出历史与现时的统一性，而正是这种统一性使过去的历史获得突出的当代性，用克罗齐的话来说，当代性才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与克罗齐同时的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步克罗齐后尘提出同样著名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将“以往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史学研究改造成为真正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用一个流行的比喻说法，即：思想是灵魂，抽掉了思想，历史或史学就将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何兆武）至于“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则同20世纪以来的所谓“语言学转向”

有关。简言之，历史并非尘封的档案和枯死的尸骨，而是经由今人构思、讲述及编撰的文本，而作为文本的历史同文学等文本并无本质差别，归根结底都是借助语言而形成的某种叙事或建构。名著《八月炮火》的作者、美国首任艺术文学院的女院长芭芭拉·塔奇曼说过，“写作艺术同历史艺术一样使我感兴趣……从长远角度来讲，最好的作家就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新史学的三个命题互相关联，一气呵成，分别着眼于史学的当代性、思想性和叙事性，即所谓文、史、哲。它们的共同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将史学从以往的客体本位转向现在的主体本位，将历史从某种编年史的“木乃伊”变成洋溢着青春、生命与活力的“有机体”，犹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活生生图景。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文里对此作了生动阐述，他说：“（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接，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

任何学科都包含三个不同的层面，即知识、理论和思想，新闻传播史学科也不例外。知识构成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可谓系统化和条理化的

知识，而思想则是从理论中提炼的精华。比如，经济学的知识多如牛毛，而形成一套类似剩余价值理论的已屈指可数，至于达到马克思那种思接千古、视通万里、酣畅淋漓、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者更是凤毛麟角。本书的讲述不满足于知识的积累，不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事实的罗列，如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办了某份报纸，或某年某月某日有几家电台、几个频道、几家网站等，而希望向更加深广的领域拓展，特别是理论的透视和思想的升华，否则也难免成为死的历史或“物的历史”，而难以成为活的历史或“人的历史”。亨利·贝尔（Henri Berr）说得好，史料的搜集并不比集邮或搜集贝壳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半生从事新闻工作的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的著名演讲里，也以通俗笔墨写道：

事实的确不像鱼贩子案板上的鱼。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

缪斯

